



Joyce
1988



Sontag
1992



Bishop
1994



Keats
1963



Chaplin
1964



Warren
1985



Updike
1984



Becket
1981



Akhmatova
1980



Balanchine
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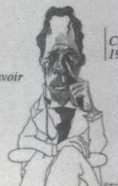
Vidal
1976



Dekooning
1975



de Beauvoir
1974



Chekhov
1973



Tolstoy
1972



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

——《纽约书评》论文选 1963/93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高红 乐晓飞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Beatles
1965



Woolf
1966



Mailer
1967



Nabokov
1969



Stravinsky
1971

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

——《纽约书评》论文选 1963/93

[美] 罗伯特·希尔福斯/芭芭拉·爱泼斯坦 编

高宏/乐晓飞 译

石 涛 译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 纽约书评论文选/ (美) 希尔福斯, (美) 爱泼斯坦编; 高宏, 乐晓飞译.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1

书名原文: Anthology: Selected Essays From Thirty Years of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ISSBN 7 - 80109 - 364 - X

I. 一… II. ①希…②爱…③高…④乐… III. 书评 - 美国 - 1963 ~ 1993 - 文集 IV. G23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5965 号

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

——《纽约书评》论文选 1963/1993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编辑部 66117130 66163377 - 648

发行部 66171396 66163377 - 617

E m a i l : cctp@public.east.cn.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0.875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定 价: 19.80 元

ANTHOLOGY

Selected Essays from Thirty Years of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Copyright © NYREV, Inc., and the author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9 by Tao Shi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者序言

严肃而有趣：喧闹时代的独特声音

这是一个媒体泛滥的年代。虽然电视正以压倒优势席卷人们的媒体视野，但还是有很多人喜爱杂志，因为前者太快，转瞬即逝，而杂志则能在你的手中逗留数天，尽管它无法像书一样在你的生活里逗留数周、数月、数年、乃至终生。但如果有人告诉你，世界上居然存在可以像书一样被人珍视的“好”杂志，你立刻会露出玩世不恭的表情：好杂志？

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样的杂志算是好杂志？你的回答可能很难，因为在你看来，能够称之为“好”的刊物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或者从来不曾出现过。这里的关键词是“好”，而“好”的标准太难以界定了。不过，就我此生读过的无数刊物中，确实有一本可以当之无愧地用“好”字来形容，那就是《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它的译名很容易使人把它同《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混淆。不光是在中国，即使是在它的出版地美国，也一样会遭遇这种混淆。当这种情形发生时，《纽约书评》的读者会感到莫名的伤心；毕竟，商业时代的读者只青睐

大发行量的报刊。当然，将两者混淆的人肯定是《纽约时报书评》的读者，他们不光没有读过《纽约书评》，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份杂志。

说是一份杂志，却没有杂志的外观。《纽约书评》朴实的外表看上去更像一份报纸，比四开略小，但比八开大，新闻纸印刷，没有装订，像报纸一样对折叠在一起，每两个星期出一份，除了订阅，你只能在书店或比较有规模的报刊店（Newsstand）才能买到。当然，此刊真正的读者群几乎都是订户，因为怕来不及去买而错过了某一期。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谁会在乎一期杂志呢？事实上的确有人在乎，他们就是《纽约书评》的读者。如果有一天他或她不再订阅《纽约书评》，那定是由于他们或者穷得快没饭吃了，或者失去了获得的渠道，比如我的情况。

第一次读《纽约书评》大约是在1991年，那时我刚刚从学校毕业，搬到纽约住下来。在此之前我也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只知道《纽约时报书评》的存在，并且是它的读者。在美国，只要是关心图书出版的人，谁会不读它呢？之后有一天，有个朋友告诉我，《纽约书评》上刊登了一篇昆德拉的文章。我于是找来《纽约时报书评》，发现没有昆德拉的文章。我打电话问这个朋友，他听后笑着告诉我不是《纽约时报书评》，而是《纽约书评》。于是我的生活里第一次出现了《纽约书评》，于是我成为它的忠实订户，直到我离开美国。

如果要我指出这本杂志的最重要的特点，我想我会用这样两个词：严肃和有趣。作为一份专给读书人看的以文字为主的杂志，兼具这两个特点是极为不易的事情。一份杂志严肃而无趣，令人觉得沉闷、厌倦；但如果有趣而不严肃，又会让

人觉得无聊和浅薄。如果《纽约时报书评》的评论对象主要是商业畅销书的话,那么《纽约书评》的评论对象大体可以说是知识阶层的“热读书”。所谓“热读”,指的是文化阅读意义上的广受关注,而不是商业销售上的辉煌业绩。这一分野,使《纽约书评》与《纽约时报书评》成为风格截然不同的刊物。从某种向度上,它也许和英国泰晤士报的周日文学增刊(*Times Sunday Literary Supplement*)存在亲缘关系,尽管后者的商业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浓厚。

虽说是以书评为主,但每期都会有一两篇重头文章,由名家撰写,对社会文化和时事政治进行批评。这么一份朴实无华纸张粗糙的杂志,什么样的名家会为它撰稿呢?从我开始阅读《纽约书评》的时候起,出现在作者名单上的人包括:昆德拉、米沃什、哈维尔、布罗茨基、苏珊·桑塔格、萨义德、亨廷顿、阿兰·布卢姆、奈波儿、索尔仁尼琴、富恩特斯、帕斯、纳丁·戈迪默、费正清、史景迁、托多罗夫、布尔迪厄、索尔·贝娄、戈尔·维达、以塞亚·伯林……几乎所有世界级的知识人物都是它的作者。可想而知,它在西方知识圈里具有什么样的影响。与其说是因为它的作者群让人刮目相看,不如说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思想立场吸引着读者。简言之,就是我们称之为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独立思考、尖锐、富于创见性、社会批判责任、前沿思潮、美文和恰当的幽默(这最后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它的专职漫画家大卫·列文[David Levine]的插图上)。对好书的关注和钟爱,不但成为《纽约书评》的宗旨和知识阶层阅读的航标,也从思想著述的角度为这个动荡的世界作了独特的见证。记得1994年初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从信报箱里取出了信件、邮寄广告、《纽约书评》和一个用硬纸板包装的结实

《纽约书评》论文选 1963/93

实的邮件。我先浏览了一遍《纽约书评》的目录,然后打开邮件。我原以为里边是我邮购的音乐 CD,但滑落到我手上的是一本书,封面上的标题是: *ANTHOLOGY: Selected Essays from Thirty Years of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文集:纽约书评三十年文选)。《纽约书评》杂志社为自己三十年的成长画了一幅肖像。读过之后,这本书我一直珍藏在身边。六年后的今天,我把它奉献给中国读者。

石涛

1999 年冬于北京

目 录

译者序言

政治与社会

- | | | |
|-----------|------------|-------|
| 汉娜·阿伦特 | 关于暴力的思考 | / 1 |
| 安德列·萨哈罗夫 | 我为什么不屈服于权力 | / 39 |
| 以塞亚·伯林 | 爱因斯坦和以色列 | / 65 |
| W.H.奥登 | 偏头痛 | / 87 |
| 伊丽莎白·哈德维克 | 瓦兹事件之后 | / 97 |
| 琼·迪迪安 | 在萨尔瓦多 | / 107 |

文学与艺术

- | | | |
|-----------------|----------------------|-------|
| 苏珊·桑塔格 | 论摄影 | / 131 |
| 罗伯特·洛威尔 | 两个诗人 | / 155 |
| 约瑟夫·布罗茨基 |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 | / 175 |
| 布鲁斯·查特温 | 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 | / 191 |
| 斯特拉文斯基 | 生命之泉
——关于贝多芬的一次访谈 | / 223 |
| 罗伯特·休斯 | 安迪·沃荷的崛起 | / 233 |
| 戈尔·维达 | 热爱飞翔 | / 255 |
| 彼埃尔·布莱兹 | 马勒的重现 | / 289 |
| 加布里埃尔·安南 | 来自德国的女孩 | / 307 |
| Thich Nhat Hanh | 一个僧侣诗人在越南 | / 327 |

关于暴力的思考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犹太裔美国思想家。原籍德国, 1928 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3 年纳粹在德国掌权后流亡巴黎。二次大战开始后移居美国, 曾长期在纽约社会研究学院任教, 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致力于抢救纳粹极权主义压迫下散失的犹太人著作, 尤其是瓦尔特·本雅明的作品。阿伦特于 1975 年去世, 死后声誉日隆, 被认为是本世纪最重要的犹太思想家。她的著作主要有《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人类的状况》(*The Human Condition*),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 以及《论暴力》(*On Violence*)。本文最初发表于 1969 年 2 月 27 日的《纽约书评》, 是《论暴力》的精华部分, 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一]

这些思考是由前几年发生的一些以二十世纪为背景的事件和争论引起的。

的确，正如列宁所预测的那样，这个世纪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世纪，也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纪。当前看来，暴力正是这些战争和革命的共同点。然而，影响当今形势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尽管并未有人将它预测出来，但它至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就是暴力工具的技术进步，它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没有一种政治目标能与它们的毁灭潜力相比，也没有一种政治目标能证明它们在武装冲突中的实际应用是否得当。因此，自古以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最终仲裁手段——交战——已经黯然失效。超级大国之间的“启示录”式的对弈，也就是驾驶人类文明所制造出的最先进飞机进行的比赛是按照这样的规则展开的：“任何一方获胜，都意味着双方的末日。”此外，这种比赛与以往的任何战争形式均无任何相似之处：它的“理智的”目的不是取得胜利，而是互相

威慑。

由于暴力与权力、武力和气力不同，它常常需要工具（正如恩格斯很久前所指出的）。因此，技术上的革命，也就是在工具制造方面的革命，对战争来说尤为重要。暴力行为的本质是由实施暴力的手段和目的所决定的，而这两个方面如果应用在人类问题上，往往会体现出这样的主要特征：目的面临被手段压倒的危险。这既合情合理，也是必需的，因为人类行为的目的与制造的产品不同，根本无法进行可靠的预测。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往往与短期目标——而不是未来世界——更密切相关。此外，一切暴力本身都包含着任意的因素，没有什么地方比战场更能让命运——无论是好运还是厄运——扮演重要角色了。只有确定的相互毁灭欲才能排除这种“任意事件”的干扰，竞赛理论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那些致力于完善毁灭手段的人，最终使技术的发展达到这样一种水平：他们的目标——战争——也快要被完全消灭了。这正是无处不在的难以预知性的一个象征。

任何关心历史和政治的人，都不可能对暴力在人类事务中惯常扮演的角色毫无知觉，但人们却很少重视暴力的角色并给予特殊的考虑（在最新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暴力”一词连个条目都算不上）。这显示出人们对暴力以及它任意的本性的理解是多么肤浅，对这个问题已经忽视到了何种程度：没人对显而易见的事情提出疑问或进行检测。所有从过去的记载中寻求某种启示的人，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暴力看成是边缘现象。无论是把战争称作“用其他手段持续进行的政治”的克劳塞维茨，还是把暴力解释为经济发展加速器的恩格斯，他们的重心都在政治或经济的持续性上，都

强调一个由先于暴力行为发生的事件所决定的过程。因此直到最近，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生们还认为：“与民族力量的深层文化根源相悖的军事决策无法稳固这一说法是一条箴言。”他们还认为，用恩格斯的话说，“凡是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与它的发展相抵触时，”采用暴力手段的政治力量将会失败。

今天，所有这些关于战争与政治或暴力与力量之间关系的陈旧说法都已不再适用。我们知道，“少量的武器就能顷刻间摧毁一个国家能力的来源。”我们现在知道，生物武器的发明使得“个人小集团……能颠覆战略性的平衡”，它的成本低得也足以使那些“无力发展威力惊人的核武器的国家”有能力制造。我们知道，用不了几年时间，机器战士将完全取代人类战士。我们还知道，在常规战争中贫困国家之所以显得远没有超级大国那么脆弱，正是由于它们的“落后”，因为在游击战争中技术的优越性并无多大价值，带来的更多的是不利。

所有这些令人不安的新鲜事物最终将导致力量与暴力之间关系的颠倒，同时，也预示了小国与大国在未来关系上的颠倒。一个国家可支出的暴力数量可能不再是这个国家强大与否的有力提示，也不再是这个国家抗击比自己实力弱得多的国家侵略的可靠保证。这再次令人不安地联想起政治科学上的一个最古老的见解，也就是力量是不能用财富衡量的，充裕的财富可能会腐蚀力量，财富对于共和国的力量尤其具有危害。

暴力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成效愈是让人怀疑，它在处理国内事务、尤其是在革命问题上就愈是获得信誉和欣赏。在

新左派的高调中强烈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特色，与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说法不谋而合。确凿地说，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了暴力在历史上的角色，但在他看来，这个角色是次要的；使旧的社会制度土崩瓦解的并非暴力，而是它本身固有的各种冲突。突发暴力并不导致新社会的产生。剧痛虽然发生在婴儿诞生之前，但并不是剧痛导致了婴儿的诞生。

同样，马克思把国家看作是由统治阶级支配的一种暴力工具，但是统治阶级的实际力量却并非以暴力为内容或依赖暴力而存在。它是由统治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更确切地说，由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所决定。人们常常发现，甚至有时感到悲哀，革命的左派在马克思教导的影响下，完全排除了使用暴力手段的可能性。“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其文章中坦率描述的以镇压为主的统治——紧随在革命之后出现，但只会实行有限的一段时期。除了永远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小集团制造的少数个人恐怖行动外，政治刺杀在绝大部分程度上是右派的特权，而有组织的武装起义则是军队的保留特色。

然而，在理论范围内却存在着少数几个例外。乔治·索列尔^①在本世纪初曾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和柏格森的人生哲学结合起来（这在颇为浅显的程度上与现在萨特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具有奇特的相似性），他从军事角度

^① Georges Sorel, 1847 - 1922, 法国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工团主义者，主要著作有《暴力论》、《进步的幻想》等，对革命论者影响很大。

思考阶级斗争，可是他最终提出的却不过是总罢工这一著名的神话，根本没有包含多少暴力成分。而今天，人们更倾向于把它归属为非暴力政治武器的一种行动方式。

五十年前，就连这种谨慎的提议都给索列尔招来了法西斯主义者的恶名，尽管他狂热地支持列宁和俄国的革命。萨特在给法农^①的著作《世界的苦难》所写的前言中，对暴力的歌颂远甚于索列尔在其著名的《暴力论》中所体现的态度，他的赞誉程度甚至超过了法农本人，尽管他意欲以法农的论点来结束这篇序言。萨特在提及索列尔时，仍然说“索列尔的法西斯言论”，这说明萨特对于他与马克思在暴力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是多么浑然无知，尤其当他陈述道：“不可抑制的暴力……是人类自身的再创造”，“疯狂的愤怒”正是“世界的苦难转变为生命力”的途径。

由于人对自身的创造这一观点属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传统范畴，因此以上的那些看法愈发引人注目。人创造自身是一切左派人文主义的根本基石，可是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人是通过思想创造自己的，而马克思则把黑格尔的“唯心论”推翻，认为是劳动——人类与自然之间进行的新陈代谢形式——使人类实现创造自身的这一功能。有人可能会争辩，所有这些关于人创造自身的看法的共同点，就是对人类自身状况的反抗（人作为自然物种的一类或个体来讲，自己无法掌握自己的生命，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因此萨特、

^① Franz Fanon, 1925 - 1961,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哲学家，出生于阿尔及尔，以为殖民地人民争取解放写作而闻名。主要著作有《黑皮肤、白面具》、《大地的不幸者》等。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共同看法比这种不争的事实所产生的种种行为更为中肯。尽管如此，我们仍很难否认在思考和劳动这种本质上，很平和的行为与暴力行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杀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石二鸟……躺下的是一个死去的人，但一个自由的人却站了起来”，萨特在序言中这样写道。马克思是绝对不会写这样的句子的。

我引用萨特的话是为了说明，就连革命者们中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能言善辩的代言人都未能留意到他们的思想正朝着暴力的方向发生新的转变。如果人们推翻“思考”这一“唯心的”概念，可能就会想到“劳动”这一“唯物的”概念；人们是绝不会联想到暴力的。当然，这种转变存在着自身特有的逻辑性，但这是从经验中诞生的逻辑，并非诞生于思想观点的发展的逻辑，而这种经验是以往任何时代的人都完全不曾体会过的。

新左派的悲哀是与现代武器无法理解的自毁性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在原子弹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以犯罪的暴力大规模影响政治的经验——他们在高中以及大学里知道了有关集中营和灭绝营的情况，知道种族大屠杀和严刑拷打，知道战争中会大批地屠杀平民。如果没有这一切，即使只使用“常规”武器，现代军事行动也是不可能的。

人们最初的反应是对暴力的所有表现形式的厌恶，以及对非暴力政治的全力支持。这样的运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尤其是在公民权利方面。随之而来的是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进行的抗议运动，这再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